

# 先秦文学社会功用的变迁与文学的发展

郑杰文

**内容提要** 先秦文学由“感物悦情”而生，周初执政者用《诗》等作为实施德政的“训诫工具”而使文学出现政治化倾向。孔子等仿此将诫勉对象扩展到社会下层，对《诗》《书》等作教化性阐释而使其成为“教化载体”。战国人文思潮中，诸子以哲理散文作为进身之阶，“新史官”为逐利而写史、删史、改史，使上古文学成为“自用求贵”的工具，因而具有明显的“求用”目的性。求用，使得文学内容更加贴近现实，形式更加多样化，表现方法更加丰富，使得文学表现主体发生类型性变化；求用，使得创作者个体私欲和执政者小集团私欲产生交织：它们形成合力，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 先秦文学；感物悦情；训诫工具；教化载体；自用求贵

综合来看，先秦文学社会功用有感物悦情、训诫工具、教化载体、自用求贵等变化。由于地域文化差异等原因，先秦文学发展有着严重的地域不平衡性，我们依据最先出现的文学功用变化来作如下研究。

## 一 先秦文学由“感物悦情”到“训诫工具”

考察先秦文学的原初功能，不能不涉及文学的起源。文学起源，西方有“模仿说”“神示说”“游戏说”“心灵表现说”“巫术说”“劳动说”等，我们中华有“心物说”，《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种“诗是感物自娱产物”的“心物说”，近似于西方的“心灵表现说”。20世纪依旧过着旧石器时代生活的菲律宾棉兰姥岛西南部哥打巴托山区的塔桑代人，在挖到食物比京时所唱的代表愉悦心情的“比京之歌”<sup>[1]</sup>，后世收集的我国早期的《候人歌》《击壤歌》等，都证明着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感物自娱应是文学最原初的功能。人类早期社会产生的这种以自娱作为功能的原初文学，应该没有多少社会政治性功能存在。

人类社会由部族形态发展到国家形态，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文学的功用也发生变化。我国姬周部族是发端于黄河上游的原始农业部族，逐步强盛后灭商人主华夏故地。面对周初“仇民”（《尚书·召诰》）的质疑，出于解释周人代殷为“天子”之合理性的政治需要，周公旦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天命新说<sup>[2]</sup>，并由此产生周人的主政理论，形成“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为主要内容的“德政”学说。基于这种“德政”理念，为永葆后代君王“有德”而拥有天下，周人设立了一整套教导、监督、诤谏周王的训诫系统。《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晋语六》载范文子言“古之王者……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吕氏春秋·自知》所谓“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都证明着东周至战国人对此一训诫系统印象之深。他们印象深刻的周之“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导致《诗三百》的积淀成书，周之“史献书”促成《尚书》的逐步结集。

以历代公卿列士所献诗为主体内容而流传结集的《诗三百》是先秦韵文体<sup>[3]</sup>的原初代表。从《诗三百》的主要内容为历史诗、政治诗和民生诗

来看,其最初收录结集的目的应该是出于训诫的需要,故有“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犹之未远,是用大谏”(《大雅·板》)这样的诗句遗留。那时,臣下对君王进行规劝的准绳(即君王行事的准则)约略有二:一是先王法式,二是民心民意。基于训诫、修德的需要,《诗三百》作为反映先王圣德和观察民风民情、作为警戒君王失德和了解民疾民怨的“训诫工具”而被周执政者重视,逐步沉淀结集。由此而言,在周人眼中,《诗三百》的社会功用发生着变化,即由创作时的“心灵写照”<sup>[4]</sup>而逐步被目为训诫工具之一。

历代史官整理、传播的《尚书》是中国散文文的源头。周初强调“史献书”所引发的史官对前代政治文书的收集、整理、编辑,促进了中国早期散文文的发展。周民族因原始农业而兴起,原始农业收成好主要靠经验指导,故周人尚老,并因尚老而重史。秦前金文存量,以周为最。周金文或记祀典、征战、围猎,或载赐命、诏书、盟约,在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时留下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印迹,体现着中国散文文载录史迹的历史功能。而上引《国语》所言“史献书”并作为训诫工具之一,使散文文的功用由历史功能向政治功能转化。

从我国早期的《候人歌》等的“感物悦情”到作为训诫工具之一的《诗三百》,从载录史迹的秦前金文到作为训诫工具之一的《尚书》本初篇章,不但展示着先秦文学在社会上层出现的政治化意识,而且引导着文学功用向“教化载体”演化。

## 二 “六经教化说”所展示的 “教化载体”功用

先秦文学由“训诫工具”到“教化载体”的演化,孔子“六经教化说”的作用不容忽视。这种借助前代典册而推行教化以治国的“六经教化说”,是孔子基于所处的社会形势的需要而对周公原初儒学的改造。

周人的立国基础是原始农业,原始农业生产的第一要素是土地,故以“受天命”自居的周王室强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北山》),宣扬主宰天下土地是“天”赋予周王的权力。周王以

此权力所拥有的土地分封同姓宗亲和有功之臣来藩卫王室,巩固统治。受封者率家人、徒众就封地而居住、生活、繁衍。起初,地广人稀的生产环境使他们衣食无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衣食无忧”越来越受到挑战。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社会物质生产是以算术级数增长的,而正常情况下社会人口是以指数规律增长的,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封家族的人口增长速度逐步超过其封地的物质增长速度,且此差距与日俱增,其结果便是“私田”的出现并逐年扩展规模,最终导致“季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局面的形成和“初税亩”(《春秋·宣公十五年》)政策的出现。私田被承认使得“天赐土地”理念崩塌。此社会信仰的崩塌引发“神民易位”的社会理念逐步盛行,并由此引发僭越公行、战争频仍和社会动荡。至此,神学信仰背景下创制的“周公之礼”失去了维系人心的社会作用,社会呼唤新思想新理论的出现。

此社会背景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治世理论,推行孝悌、争做仁人、恢复“周礼”而天下大治,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途径;并将周人的“训诫系统”扩而用之,发展为“六经教化治世学说”。《礼记·经解》载孔子宣扬:诸侯国以《诗》《书》等教化,可使国民“温柔敦厚”“疏通知远”等;反之,若不行六经教化,国民便“愚”“诬”等,是对“六经教化”作出治世功能的特别强调。

与强调“六经教化”治世功能相应和的,是孔子及其弟子门人对六经所做的“教化性”阐释。

作为先秦韵体文的《诗经》篇章,《周南·关雎》本为男女悦求之诗却被“教化性”阐释者解为颂“后妃之德”,并作为“风诗之始”,宣扬此类风诗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诗经·关雎序》);《小雅·鹿鸣》本是宴饮之歌却也被强调出“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的政治意蕴(《诗经·鹿鸣序》);《大雅·文王》述文王史迹却被解为“受(天)命作周”(《诗经·文王序》);《周颂·清庙》本为祭祀乐章也被解为歌颂文王之德(《诗经·清庙序》)。此“四始”之下各部分诗篇,大率作此般解说,从而将《诗经》阐释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诗经·关雎序》）的教化工具。

作为先秦韵体文、散体文兼具的《周易》原系筮书，《左传》《国语》载时人援用或解说时多重其筮占，但孔子一派的用《易》解《易》却与此不同，今《周易》之《文言》《系辞上》《系辞下》三篇中载有30处“子曰”云云的解说，其大多就爻辞本身阐释义理，很少讲象数筮占（仅有两条，均见《乾卦文言》），这与《左传》《国语》中的大量《易》说相异，而同《论语》所引两条孔子言《易》的精神一致，与其他现存先秦古籍所载孔子之引《易》、论《易》在于强调利用《周易》推行教化和指导言行、强调《周易》的社会政治性功用价值的解说方式相一致<sup>[5]</sup>，从中可看出孔子一派解《易》时那种强调教化作用的态度。

作为先秦散体文的《尚书》原录，多为前朝政书，孔子收集以教弟子。《论语·为政》曾载孔子解此类古“书”所语为：“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以推扬孝悌即是“为政”来解古“书”此语，明显关乎政治教化。关于此类以儒家仁义教化来解说古“书”之语的主张，《尚书大传》载孔子与子夏论《书》时说“《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外纪》卷九引）可看出孔子解说古“书”时重在发掘其教化功能的阐释倾向。

作为孔子整理鲁史官所记而成的先秦散体文《春秋》，后人总结其整理的关键是“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通过“笔”“削”，使《春秋》产生“乱臣贼子惧”的社会政治效果（《孟子·滕文公下》），使得读者分清善恶正误而利于政治教化推行。就孔子的“笔”“削”整理，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言“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云云，谓孔子对鲁史官所记材料通过“笔削”式的“文学改写”而成《春秋》，正因这种“笔削”，才使《春秋》具有“独断于一心”而表彰“王道”、斥责僭越来发挥政治教化功用的效果。

至于后来被整理在六经中的“礼”与“乐”，

更是孔子及其弟子、门人改造的教化工具。《吕氏春秋·适音》谓“先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礼义也”，强调乐及礼的社会政治教化作用。《论语·阳货》载孔子带领弟子到子游为宰的武城，入境即闻弦歌之声，使得孔子大加赞赏。被子游所实施的、由孔子所倡导的这种以礼乐来教化臣民的社会治理方式，被孔门后学大加肯定，如《礼记·乐记》曾言“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孔子等以“教化”解六经等传统典籍，赋予《诗》《书》等以礼乐教化改造人心而治世的社会功能，使得努力寻求社会治理方略的社会上层即执政阶层对文学（含口头文学）的治世作用更加重视起来，《吕氏春秋》谓“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尊师》），所以天子应“以道教民”（《孟春》），并督促“师，尽智竭道以教”（《劝学》）诸说，即此社会现象的反映。而执政阶层对文学治世作用重视所形成的社会舆论而导致的社会风气，为士子在人文思潮盛行时代凭借个人之力（而非像周公旦等人那样借助“神力”）发表社会治理主张（此可谓原初的“散文创作”）而崛起，奠定了社会政治文化基础。

### 三 先秦诸子散文展示的 “自用求贵”功能

前已有论，人口繁衍大大超过天子赏封之地的产出能力，使得私田大增，从而引发上下失序、僭越公行而终至神民易位，天子君侯所依附的神学权威被否定，神学时代结束，“明主饬德而序位”“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荀子·儒效》）的“竞于能力”的人文时代到来。思想家荀卿号召世人通过自己学习而逐步晋身于士人、君子以达于圣人（《荀子·儒效》），靠自己的努力获取社会地位和利益。其获取社会地位和利益的凭借物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产出的“思想作品”（含口头的）。这些“思想作品”即诸子散文，它是先秦散体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主要基于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诸子之作，与先秦

文学产生时的原初作品在创作目的、社会功用等方面，如与韵体文《邪乎》等的“感物自娱”、与散文《飞土》等的记叙史事，已经截然不同。诸子文学是因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是为了换取社会名誉、地位、利益而创作的，它体现着浓郁的“自用求贵”功能。

以自己的思想成果游说君王而求用，是人文时代诸子的普遍行为。孔子疾其学说不能在鲁推行，故离鲁出游，至卫，适陈，过宋，经陈、蔡，居楚，自蔡如叶，自楚反卫，周游列国14年，到处推阐自己的思想主张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些思想主张被后学编辑成《论语》，被弟子门人追记在《礼记》等文献中。孟子亦如是，游说不果，只好在晚年与弟子把这些“迂远而阔于事情”的言谈整理成《孟子》七篇。荀子十五岁游学于稷下学宫<sup>[6]</sup>，田单复齐而稷下学宫复盛时“最为老师”，后至楚任兰陵令，失官后在兰陵收徒讲学。由他讲述而由弟子门人所记述、追记的篇章，在社会上流传后被编辑为《荀子》。孔孟荀等儒家之外，其他如墨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乃至名家、道家等先秦诸子，无不汲汲求用以实现自己人生理想，即用自己产出的思想学说来交换社会利益，来立身、持家、换取地位。

为了吸引更多听众、招收更多学生以换取更多社会利益，先秦士子甚至使用“假造名人文章”等手段。在战国诸雄吞食兼并的战国中后期，产生了声势浩大、左右诸侯国间局势的合纵连横运动。在运动中出现了两位叱咤风云的纵横奇士张仪、苏秦。他们凭口辩之才，以布衣而取卿相，成为士子趋之若鹜的效仿对象，他们的说辞录记，也因之成为士子学习说辩的范本，成为众多的教授纵横游说权术的先生们“奇货可居”的教本，因此催生出诸多“仿苏、张之作”。今传刘向所编《战国策》中保留的张仪游说七国国君的7篇说辞，苏秦游说七国国君的7篇说辞，经笔者考证，均为后人仿作<sup>[7]</sup>。教授者借重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盛名来假造“苏、张说辞”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听课以换取更多“束脩”，其用于交换社会利益的目的更是十分明显，更加生动地表现出此类文学的“自用求贵”功能。

文学“自用求贵”功能的出现，与春秋战国神民易位、僭越公行等社会现象的发展相表里。凭依“神力”而维持统治的国王、君侯们在“私田大增”社会现实的逼压下逐渐失去经济优势，逐渐无力赡养那些有技术专长的百工和知识优长的士人，出现“大师挚适齐……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这种百工流散的局面。与此相应的是那些有知识优长的士人也逐渐失却“官养”，故知识士子为生计而出售知识，使得“官学”渐微而“私学”渐兴。邓析教民狱讼而收取报酬（《吕氏春秋·离谓》），孔子招收弟子，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们在失去或不能取得“官养”后，需要用自己的知识去“交换”生活物质保障。诸子文学“自用求贵”功能的出现，是春秋战国神民易位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 四 先秦历史散文“自用求贵”功能的出现

较之于先秦诸子散文“自用求贵”功能的出现背景，先秦历史散文的“自用求贵”功能出现的背景更为复杂。

姬周部族的主体生产方式是原始农业，原始农业进步主要靠历代积累的经验，因之周人有尚老传统和由此发展出的养老制度。周人胜殷取天下后，借用此生产经验模式去探索执政方式，形成先秦两种社会治理模式<sup>[8]</sup>中的“从古而治”模式。“从古而治”，就必须总结前朝及本族先人的治理经验，故整理传世档案而形成的各式“书”应运而生，并代代传递，《左传》所载70余次引“书”可见一斑。也正是出于这种“从古而治”的社会需要，周人特重当朝资料积累，有“君举必书”的传统（《汉书·艺文志》），因而有所谓的“百国《春秋》”传世（见《墨子》佚文，《隋书·李德林传》《史通·六家》等引）。

至战国时期，史职之官更众，周王室有“太史”，秦国有“御史”，韩国有“御史”，赵国有“御史”，魏国有“主书”，燕国有“御书”，田齐有“御史”和“掌书”<sup>[9]</sup>，等等。这些掌“书”掌“记”的史职之官秉持前辈传统，记录下繁多的历

史资料，惜乎遭焚于秦，今仅存刘向父子领衔整理的《战国策》等。

战国时期，“史官设置”及“君举必书”的文化传统均呈现泛化现象，不但各诸侯国有录记“君举”“君言”的史官，大夫封邑也设记事记言的执事，甚至连外出游说的大策士手下也有随行的记言记事之人。前者，如田齐之孟尝君田文的封邑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史记·孟尝君列传》）；关于后者，《史记·鲁仲连列传》载鲁仲连说守聊城燕将辞中有“……非忠……非勇……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诸语，“说士不载”，是说游说之士不屑载录“非忠”“非勇”“非智”之事，缘此我们可知，游说之士是记录“忠”“勇”“智”诸事、诸言的。进一步细究，游说之士载录的“忠”“勇”“智”诸事诸言的文献中，是否有他们自己记录的大策士的游说言行呢？也就是说，游说策士中，是否有人承担“记事”“记言”之职呢？《战国策·楚策三》“张仪之楚贫”章载“张仪之楚，贫，舍人怒而欲归”，此舍人，即随行张仪在楚的门客或学习纵横术的学生。这类随行门客或学生是否记录主人或老师的言行呢？查检《战国策》所载，战国人称“某子”有两种情况，一为当面交谈时对所尊士人的客气称谓，如《战国策·秦策一》“张仪欲假秦兵以救魏”章有左成谓甘茂话中所称“张子”，如《战国策·秦策二》“齐助楚攻秦”章有楚王所称“张子”，如《战国策·楚策二》“楚怀王拘张仪”章有郑袖所称“张子”等；二为事件记录中学生对老师的尊称，如《战国策·齐策二》“犀首以梁为齐战于承匡而不胜”章有“明日张子行，犀首送之至于齐疆”，此非当面交谈话，应是随张仪游齐的门客或学生的记录，故尊称张仪为“张子”。诸如此类对主人或老师的尊称，在《战国策》中还有《战国策·秦策一》“张仪之残樗里疾”章中的“张子”等数十处。这数十处有“张子”称谓的策文，理当系随张仪出行的门人弟子所记。由此我们可知《史记·鲁仲连列传》载鲁仲连说辞中所展示的纵横“说士”载录“忠”“勇”“智”之事，也包括纵横策士自己记录的老师或主人的言行。由此可证，外出游说的纵横大策士也随有记言录事之人。连游

说策士也随有“记事”“记言”之人，因而可以说，“史官设置”的传统，“君举必书”的传统，在战国时期大大泛化。借此可推知此一时期历史散文的产生数量应是相当多的。

这类“史官设置”“君举必书”传统泛化所带来的相当数量的战国时期诸侯史官、大夫封邑相关执事、策士出游的随行门人或弟子录记整理的历史散文，较之于其前王朝史官和诸侯国史官录记整理的历史散文，在录记整理目的方面有何不同呢？

史官之职，早期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分（见《周礼·春官宗伯》），其中以太史的政治地位最高，不但掌录时事、保管文书，还可“命百官箴王缺”（《左传·襄公四年》）。正是这种崇高的政治职责和职业责任感，才使得他们产生忠于职守而不畏死的职业操守。如春秋齐国“太史伯”兄弟数人前仆后继不畏死而成功如实录记“崔杼弑其君”，使得“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似这类为录记事实而不畏死之人还有《左传·宣公二年》所载的太史董狐，他因权臣赵盾在内乱中未出境而书“赵盾弑其君”，使得孔子大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史官的这种执著职守不畏死而“秉笔直书”的献身精神，导源于史官初置时其重要职守所要求的“务实原则”。《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谏周宣王时追述：“古者，太史顺时覲土”，而后告后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应该至时行籍礼而启动农事。由此可以看出太史是那个“王事唯农是务”时代的农事指导者。太史观阳气蒸、土膏动而告王者下令行农事而播百谷，其播谷时节绝不可轻率而定，决不能稍有差池：播种过早则有春冻毁坏幼芽之虞而绝产，播种过晚会致庄稼遭秋霜使籽粒不实而减产。求实求准，成为史官初置时期指导农事等工作的职守原则。此原则加以扩衍，成为历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准则。他们秉持此一精神准则，录记史料，整理史书，因而作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被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但至战国史者记事，渐次与此精神准则有异，“不虚美，不隐恶”的职守传统日失。如田齐史官记事，为了瞞田齐桓公午弑君篡位之恶，竟然隐

去一代国君田剡近10年间事迹，致使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误书“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此一隐情，至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据晋朝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资料加以考证，方将田齐太公田和之继位者考实为田剡以及田剡执政九年（丙午，公元前375年）其弟田午弑兄自立的真相，白于天下。如此“隐恶”记事，相较于齐太史四兄弟冒死据实记“崔杼弑其君”，真乃天壤之距！

不但战国诸侯国史官失却“秉笔直书”精神而使得史籍缺失“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战国策士记事，更因某些原因而冒名假记，虚构事件。如刘向等据战国策士记录而编辑整理的《战国策》中，竟然将苏秦诸事冒名“苏代”而假记，致使司马迁《史记》错误地颠倒了张仪和苏秦的活动年代，谓苏秦合纵成名后，张仪始从事连横活动。直至20世纪下叶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帛书，唐兰、杨宽、马雍等学者才据帛书等考证清楚：苏代是苏秦之兄；张仪从事连横事业大成，苏秦方开始合纵活动<sup>[10]</sup>。

战国史者记事不能继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职传统，某些诸侯国史官“隐恶”删史，某些纵横策士冒名假记，其主要原因在于史职选择制度的变化而引发的被选人录记历史的从职目的，与其前史官记事目的之间存有本质差异。清人俞正燮曾总结说：“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癸己类稿》卷三《乡贤贤能论》）春秋末之前，史官世传世守，如司马迁所言自己家族的史职传递（《史记·太史公自序》），如周景王所言籍谈家族的史职传统（《左传·昭公十五年》），任职者以维护自己家族的传统职业、恪守传统职业道德为荣。至春秋末私学兴起，社会上渐有“以能选官”现象出现，孔子学生、墨家弟子等均有被召请任官吏者，策士随行记事者更是策士自己出资聘请随员，原本“世传世守”而当然任职（此可比匡天子之位由“天命”“天授”）的神圣史官，也在此“雇佣选聘”潮流中沦为一种社会谋生职业。这种被选任记事记言者的身份的变化，使得他们的从职目的也发生质的变化，战国记史者再无其前史官们那种

忠于家族职业操守而如实记事至“不畏死”的道德情操，他们从事记事记言职务的目的是为获取佣金收入等个人利益；一旦此目的难以达到，便会出现“张仪之楚，贫，舍人怒而欲归”（《战国策·楚策三》“张仪之楚贫”章）之类的辞职事件，这与墨家仕卫弟子因原来卫君许诺“待女以千盆”而至则“授我五百盆”，故“为其寡”而辞职返回墨家集团（《墨子·贵义》）事件的原因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在那个已经变化为军队战员皆“干赏蹈利之兵”、做官为吏成“佣徒鬻卖之道”（《荀子·议兵》）的战国时代，记事记言之职不再成为世传世守的家族神圣职业而沦为谋生途径和赚钱手段，因而出现依此任职目的而删增历史甚至假造历史之类的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出于谋生、赚钱等个人目的而记录整理的战国历史散文，成为记录整理者交换个人利益的工具，这样的历史散文也就沦为“自用求贵”的介质了。

## 五 先秦文学社会功能变迁 所产生的文学效应

由上述可见，先秦诸子散文可使士子“贱而贵”，历史散文成为谋生、赚钱工具，这样的散文已基本不再是“感物悦情”的大众艺术品，而成为时人汲汲求用的社会工具，有浓烈的“求用”目的性。

先秦文学这种浓烈的“求用”目的性，使得文学的内容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和人生。先秦散体文中，诸子哲理散文皆为社会需求而产生，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今以流传至今文献遗存较多的几家来看。儒家《论语》《孟子》《荀子》各家，绝大部分章节、篇论述社会和人生<sup>[11]</sup>；《墨子》今存53篇，胡适将其分为5组，第二组“十论二十五篇”阐述墨家十大社会主张，第一组“前七篇”和第四组“后五篇”记述墨子与师徒及时人间的问答，均关涉社会问题，第三组“墨辩六篇”总结科技及逻辑之用，第五组“守城十一篇”总结军事技术，皆关乎社会之用；法家《韩非子》讲社会治理和朝堂执政的“法”“术”“势”之用；杂家《吕氏春秋》总结先秦诸子社会治理人生感悟理论；兵家著述，无

论《孙子兵法》《孙臆兵法》，还是《六韬》《吴起子》等，均阐述兵法运用。即使是道家，《道德经》中也有 44.5% 的社会论说<sup>[12]</sup>，《庄子》33 篇由论辩而产生，且寓言故事多为解说“经句”之用<sup>[13]</sup>，故可被认为是解说社会问题。可见诸子散文的主体内容基本是关乎社会事物、社会经验和人生问题的，基本因社会治理、社会进步、人生需求之用而产生。作为先秦散文主体之一的先秦历史散文载录社会及历史事件，也是为人们认识历史和社会、总结历史经验等社会之用而作。所以说，贴近现实，是先秦文学“求用”目的性带来的先秦文学的内容特点。

先秦文学的“求用”目的性使得先秦文学形式多样化发展，其主要表现为韵体文的文体形式多样，如《诗经》类、上古歌谣类以及后来的乐府诗、五言诗、七言诗等。

先秦文学的“求用”目的性使得先秦文学表现主体发生类型性变化。今以先秦散文为例来分析。先秦文学的“求用”目的性逐渐启发世人看清社会事件的主体是人，从而引发先秦散文的表现主体自先秦到两汉发生着从“记事为主”到“写人为要”的类型性变化。《左传》以时序为纲主记历史事件，而同样作为历史散文的两汉史传作品如《史记》的主体部分“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却无一不以人物为记叙主体，《汉书》等史传作品延续了这一体例。这种文学表现主体发生类型变化的过渡样态，保存在“战国策文”中。今以刘向等整理的《战国策》来看此过渡样态。《战国策》保存了“战国策文”496 篇，其中可以考出写作年限（或大致写作年限）者 342 篇。这 342 篇中，产生在合纵连横运动前（公元前 344 年以前）<sup>[14]</sup> 的有 34 篇，可以作为战国策文酝酿阶段的代表；产生在合纵连横运动初创期（公元前 344 年至公元前 308 年）的有 89 篇，可以作为战国策文奠基阶段的代表；产生在合纵连横运动鼎盛期（公元前 307 年至公元前 284 年）的有 121 篇，可以作为战国策文发展阶段的代表；产生在合纵连横运动持续期（公元前 283 年至公元前 221 年）的有 96 篇，可以作为战国策文成熟阶段的代表<sup>[15]</sup>。战国策文酝酿阶段 34 篇策文中，记事为

主者 25 篇约占 74%，写人（或人言）为主者 9 篇约占 26%；战国策文奠基阶段 89 篇中，记事为主者 61 篇占 69%，写人（或人言）为主者 28 篇占 31%；战国策文发展阶段 121 篇中，记事为主者 54 篇约占 45%，写人（或人言）为主者 67 篇约占 55%；战国策文成熟阶段 96 篇中，记事为主者 51 篇占 53%，写人（或人言）为主者 45 篇占 47%；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记事篇数与写人篇数的前消后长关系。这种消长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战国时期人文思潮盛行所带来的“平民可以智以言取卿相之位”的社会现实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更加重视人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在于上言战国策文学习仿效的记录目的，在于“求用”目的性的驱使。“求用”目的性对先秦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先秦文学的“求用”目的性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还在于彼时作者为获得欣赏而在创作中不断丰富文学表现手法。先秦诸子之作开始的文学“自用求贵”，使得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由“心灵抒发”为出发点来实现自娱乃至娱人的“自适性”价值追求，变化到鬻换自我希冀的物质、名誉、地位的进取手段的“探求性”价值追求，表现出前后作者文学创作心理的重大变化——前者表现出“天放式”的心灵抒发，艺术审美特色浓郁；先秦诸子之作则表现着“汲汲以取”的心理企及，社会价值追求强烈。为使作品达到“求用”目的，作者们在创作中不断丰富着文学的表现方法。下面我们以战国策文之写人（或人言）为主的策文的篇幅、结构、形象、手法等文学形式的发展来看这一问题。

在上述战国策文的四个发展阶段中，酝酿阶段的写人（或人言）为主的策文有 9 篇，其中没有长篇，只有 1 篇中篇，却有 8 篇短篇；人物形象甚不丰满。奠基阶段的写人（或人言）为主的策文有 28 篇，其中没有长篇，仅有 2 篇中篇，却有 18 篇短篇，人物形象也不丰满；发展阶段的写人（或人言）为主的策文有 67 篇，其中长篇已有 16 篇，策文大都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形象鲜明，有的还初具文气；成熟阶段的写人（或人言）为主的策文有 45 篇，其中长篇已达 28 篇，占 62%，并出现了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用细节描写表现人物、通

过对话和动作表现人物等文学手法,如《赵策四》“赵太后新用事”章<sup>[16]</sup>。此一时期,还出现了堪与《史记》的人物创作手法相媲美的策文,如《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章,为了塑造荆轲的悲壮勇武形象,策文中运用了夸饰描写、细节描写、铺垫衬托等文学手法,且这样的手法在其他成熟阶段的策文中也可见到<sup>[17]</sup>。因此,战国策文可以成为先秦散文成熟的标尺,它承载着先秦两汉散文从“记事为主”到“写人为要”的文学发展历程。

由上可以说,先秦文学的“求用”的目的性调动了创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主体是人,人的利益有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分。与此相应,欲望亦有私欲与公欲之两极。原始社会之公欲的维持靠神灵的威慑力,为了公欲在祭祀神灵时活人可以被挖心、砍头。神人易位后,私欲成为社会欲望的主流。慎到曾言“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意林》引《慎子》佚文),曾言“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意林》引《慎子》佚文)。私欲可以分为个体私欲与小集团私欲,而先秦“求用”文学正好是个体私欲与小集团私欲的结合点。例如先秦诸子散文的创作。在那个由“贵戚之卿”向“异姓之卿”(《孟子·万章下》)转移后的争于力、竞于智的时代,诸子们基于求用、求利、求禄的个体私欲而广泛传播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执政集团为国富兵强以吞并他国掠夺土地和人民的小集团私欲而招贤纳士来获取适用的思想主张,这“思想主张”记录下来就成为诸子散文。诸子们求用、求利、求禄的个体私欲与诸侯国执政集团国富兵强吞并他国掠夺土地人民的小集团私欲,因诸子散文而联结在一起,促进了诸子散文的发展。不同对象的欲望的交织促进了诸子散文等先秦文学作品的主动创作,促进了先秦文学的发展。

## 结 语

先秦文学由“感物悦情”而生,周初执政者用来作为“训诫工具”使其社会功用日趋政治化。孔子等仿此将诫勉对象扩展到社会下层,并将《诗》

《书》等典籍做“教化式”的阐释改造,从而使得社会上层重视“教化式”文学的治世作用。人文思潮下的士子受此启发而将创作作为“进身阶”,使得散体文中的哲理散文、历史散文均成为“求用”工具。求用,使得先秦文学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和人生,表现形式多样化发展,表现主体发生类型性变化,作者在创作中不断丰富着文学的表现方法;求用,调动了文学创作主体和文学创作受体两方面的积极性;它们形成合力,促进了先秦文学的发展。

[1] 刘达成等编译:《当代原始部落漫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 《尚书·咸有一德》:“天难谄,命靡常。”《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3] 先秦文学作品呈现着初生时期的原始状态,难以用后世的文体概念来划分,故我们把先秦文体粗略地分为韵体文和散体文。

[4] 冷鑫《诗经:初民的心灵史》谓此,见《光明日报》2017年12月7日。

[5] 说详董治安、郑杰文《经学的产生》,载《经学十二讲》,第6—8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6]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但刘向《荀子序录》作“年十五始来游学”,应劭《风俗通义·穷通》曰:“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

[7] 考详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第175—183页、第226—23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 先秦社会治理模式有儒墨等家的“从古而治(或言‘从史而治’‘从先王而治’)”模式,和道家(含黄老)、纵横家等的“从天而治(或言‘从四时而治’‘从自然而治’)”模式。前一模式来源于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后一模式导源于长江流域的冶制手工业。此容另文详论。

[9] 战国时期,周王室有“太史”,《史记·周本纪》载“周太史儋见秦献公”;秦国有“御史”,《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御史前书曰”;韩国有“御史”,《战国策·韩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章载张仪说辞中有“秦王使使者献书大王御史”;赵国有“御史”,《战国策·赵策二》“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章载张仪说辞中有“敝邑秦王使臣敢献书于大王御史”;《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相如顾召赵御史”;魏国有“主书”,《吕氏春秋·乐成》言“(魏)文侯知之,命主书曰”;燕国有“御书”,《战国



策·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章载苏代致燕王书中有曰“故献御书而行”；田齐有“御史”，《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曰‘执法在傍，御史在后’”，有“掌书”，《吕氏春秋·骄恣》言“（齐宣王）遽召掌书曰”。

[10]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第123—201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11] 《论语》512章中，论述社会人生者507章占98%，关涉自然者5章占2%，参见郑杰文《上古两大主导文化系统及其思想影响》（载《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的统计。《孟子》260章中，论述社会人生者257章占99%，关涉自然者3章占1%，参见郑杰文《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两种文化类型》载《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的统计。《荀子》今存32篇，均为主题性论文，其中除《天论》篇中涉及天体宇宙等外，其余篇章均以论述社会人生为主。

[12] 参见郑杰文《上古两大主导文化系统及其思想影响》（载《孔子研究》2001年第2期）的统计。

[13] 张默生提出“《庄子》一书，大部分是攻击名家的言论，少部分是反对儒墨的学说”，“多用‘寓言’和‘重言’来证明总论中的归结之点”。见张默生《庄子新释》，第41页、第8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14] 时间界定见郑杰文《中国古代纵横家论》，第152—27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 参见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第111页表二，第184至185页表五，第183至184页表四，第237页表八，第266至267页表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6] 参见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第187页，第184—191页，第236—247页，第266—267页。

[17] 参见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第345—348页，又见第301—306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责任编辑：李超

#### 投稿须知

为进一步规范审稿流程，完善匿名审稿制度，本刊在实行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全流程双向匿名审稿。请您在投稿时删除附件（原稿件）中与作者相关的所有信息，作者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学历、职称、工作单位）请在投稿页面相应的位置填写，否则，投稿无效。

《文学评论》编辑部  
2022年1月15日